

# 我们与莫朴的距离

■方隽书

在整理莫朴资料的百余个日夜里,我们不断穿梭于两种温度之间——杭州春夏的炙热阳光和浙江美术馆地库的恒温冷气,恰如我们与史料纠缠时常常会陷入的两种状态:时而因发现有趣材料而变得热情高涨,时而因面对历史的重量而静静沉思。从数字文件到实体文献,从模糊的印象到清晰的认知,展览的筹备本身就带有发掘的性质,使我们一步步接近独属于莫朴的艺术领域。从最初构想至最终呈现,这场展览历经磨砺,终于呈现出如今我们所见的完整形态。

我们与20世纪的那段历史究竟隔着多远的距离?坦白而言,此前的莫朴对于我更多是存在于校史中符号般的人物,有的只是老校长、革命题材、写实风格等标签化的印象,像是远远伫立在历史彼端的一个笼统的剪影。而随着整理工作日渐深入,莫朴的个人笔记和来往书信被仔细研读,一件件蒙尘的手稿和原作呈现在眼前,莫朴艺术人生的方方面面都悉数铺开之际,一位立体而富有温度的人民艺术家形象逐渐清晰,过去的历史触手可及,一切宛如打破了一堵壁障般令人豁然开朗。

莫朴的青年时代在9号厅“倾心向太阳”板块悉尽展示。以时间和地域为线,观者得以了解莫朴与志同道合的友人们在民族存亡之际的奔赴。创立国难宣传团时莫朴年仅18岁,深入辽阔的中原西北大地,以画笔宣传启智和唤醒民众,奠定了革命文艺工作者的身份。展示的文献和作品不仅是莫朴个人青春岁月的注脚,更是有志青年的时代缩影。年轻人的一腔热血与艺术热忱遥相辉映,为沉郁的时代点燃了独属于自己的明灯。

展览的8号展厅位于中心位置,也是串联了莫朴一前一后两个人生阶段的核心区域。这里并置着莫朴的主题性创作与个人写生作品,“朴直燃心灯”与“唤起新感情”两个板块在深红背景的映衬下形成了一种对话关系。《清算》《南昌起义》《苏维埃万岁》等历史主题作品讲述的是恢宏的叙事性,而展墙另一边,风景和人物写生则流露出莫朴对大自然和生活的真挚情感。二者看似创作取向不同,实则共享了同样的理念,共同形成莫朴艺术创作的整体面貌,即艺术源于生活,艺术为了人民。全心全意地记录历史、关切民族命运,也不忘拾起日常生活的细腻情感,这便是莫朴的创作脉络。

创作者经常面临的问题是如何协调作品的社会使命与个人表达。之前与同行的同学观看莫朴画作时想到了“土油画”这一名称。初闻此称的对方感到诧异,如何能用“土”来形容莫朴的作品?事实上这一概念并非



莫朴 清算 90×115.5cm 布面油画 1948年 中国美术馆藏

贬义,而是对那个特定时代艺术家探索油画成果的概括,也是一种美学上的立场。如肖峰所评价,土油画“没有丝毫媚俗、矫揉造作之感”,“初看貌不惊人,当人们深入其中,却有无穷的回味”。那代人大多怀有强烈的民族意识,肩负着集体叙事的使命,与时代进行着谈判。陆琦在研究中指出,莫朴醇厚朴实的画面扎根于传统文化,又与一般民众审美相契合,独特的美学特点使得这种风格变得无法超越。作为艺术家的自觉选择,土油画充分体现了西洋油画与中国土壤的交融,是对本土现实深刻关注与认同的产物。观看莫朴的作品,我们看到的不仅是一个艺术家在风格上的坚持,更是对所处时代文化背景的接纳和探索。

7号厅以“美育又重弹”为主题,带给观者对于莫朴晚年艺术探索与教学相长的思考。默立在中央的拐杖是莫朴的贴身之物,常出现在莫朴后期的个人影像中,满目的痕迹诉说着沧桑和坚韧。后方是一面宽大如墙的黑板,浙派人物画的革新之作、周昌谷笔下的《两个羊

羔》就陈列其上,与莫朴的数条教学思想并置着。展柜尽头,黎冰鸿所作的《莫朴像》与莫朴的讣告形成了意味深长的映照,鲜活的面孔戛然而止,人们就这样看完了莫朴的一生,凝视这些物品,激动却怅然的心情不言而喻,在回想莫朴的艺术人生时,是否感觉与他的距离更近了一些?

向前走的同时,我们需要一个回忆的契机,怀念来时的路上都有谁曾经走过。观看这些文献的过程,也是重新认识历史的过程。时间不可逆地朝前推进,但通过不断发现的文献与作品,我们得以逐渐接近过去的真实,以自己的方式理解属于那个年代的记忆。莫朴那一代艺术家面临的问题至今仍以不同形式存在着,莫朴对艺术的探索和实践始终会成为我们思考当代艺术发展的有力参照。让本不了解莫朴的人认识他的艺术,让本就熟悉莫朴的人在他的艺术世界里寻找新的维度,让历史成为可以与当下对话的存在,也许就是这场展览带给我们最现实的意义。

# 与陈履生的几段往事

■程伟

我与陈履生先生的交集,始于对钱松喈先生艺术成就的共同关注。几段往来旧事,至今想起仍清晰如昨,字里行间尽显先生的文人风骨与人格温度。

2018年10月,武汉美术馆举办“江南春——钱松喈50年代作品展”,我应钱松喈外孙女钱春涛之邀,以先生家乡人的身份参加开幕式。正是在那场展览中,我第一次见到陈履生。他担任学术主持,正神情专注地为观众讲解钱先生的作品。展厅里陈列着60余幅钱松喈20世纪50年代的创作,以及《砚边点滴》理论手稿与相关文献,静静勾勒出一代艺术家的创作轨迹。此前,我曾为展览撰写《古拙稳健、凝重深厚——钱松喈书法初探》一文,陈履生读后特意找到我,说了一句:“你是专题研究钱先生书法的第一人。”这句话既是一种认可,也让我对这位学术前辈肃然起敬。后来,该文被收入湖北美术出版社出版的展览作品集,成为我们相识的一份珍贵见证。

第二次相见,是2019年7月31日在中国美术馆举办的“笔墨松喈——钱松喈诞辰120周年纪念展”上。展览作为中国美术馆捐赠与收藏系列展之一,以“祖国山河抖擞描”“迢迢我自江南来”“拾翠披云寻我师”三大主题

展开,汇集馆藏20件、家属提供100件作品,以及诗稿、创作草图等文献75件。陈履生先生依旧担任学术主持并主持开幕式,举手投足之间满是对钱松喈艺术的敬重。我那时协助钱先生家属参与作品交接与清点,忙碌间与他匆匆点头致意,却仍能感受到他对每一件展品的珍视——撤展时,他亲自为每一幅作品拍照,整体的、局部的,一一留存。

两次见面之后,我与陈履生的交流渐渐多了起来。我们多是闲聊艺术与文化,却总能在细微处见其真性情。有一回,他来宜兴,顺路到我工作室喝茶。见我在紫砂壶上刻字,他饶有兴致地驻足观看,随后笑着说:“帮我定制20个壶,有空我来刻。”一个多月后,他如约而至。尽管当时只有一小时的空闲,他却从容执起刻刀——以握笔的姿势持刀,以写字的力道行刀,指尖流转之间,20把壶很快刻毕。他一边刻一边说:“我们不是专业刻字的,关键要体现文气与书写性。”后来壶烧制完成,我专程送至他在江苏镇江扬中的“陈履生美术馆”。见到那些带笔墨意趣的壶陈列在馆中,我忽然明白,他对“文气”的追求,早已融入了生活的点滴。

在北京时,我曾邀陈先生小酌。他却只以小盅浅尝一口,轻声说:“最近身体不适,等恢复好了,咱们好好喝一回。”又半开玩笑地说道:“你年纪比我小,酒量未必如我。”当时我未多在意,后来才知,那时他的身体已亮起红灯。那句玩笑之中,藏着一份不惊不变的豁达。我最后一次见他,依旧是在宜兴的工作室。他还是来喝茶,临走前为我题写册页一帧——“程伟将进酒紫砂陶刻拓本”,笔力道劲,墨韵饱满。另赠我一本《博物馆之美》,可惜我当时忘了请他签名。

其实,在见面之前,我早已久仰陈履生之名,读过他许多艺术评论文章,尤其在《美术报》上的专栏“陈履生观点”,我每篇必读。他的文字观点鲜明、见解独到,读后总令人深受启发。

如今再忆与陈履生的交往,他作为学者的严谨、作为画家的才情、作为长者的温和,仍清晰印在脑海。他以对艺术的赤诚,在文化的土壤中深耕不辍;以对生活的热爱,在笔墨与陶刻间传递文心。那些往来片段,或许平淡,却如温润之玉,历经时光打磨,愈显珍贵——也让我更加读懂,何谓“文人风骨”,何谓“艺术情怀”。